

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缺陷析

楚渔

(首都书画艺术研究会,北京 100097)

摘要: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是一种形象思维,缺乏分析、综合、抽象等逻辑思维过程,长期停留在感性阶段。思维的混乱必陷入思维怪圈,思维的怪圈必陷入僵化,从而构成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缺陷。这种混乱而僵化的思维模式影响了中国的进步。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混乱僵化;中国进步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1)02-0130-06

这里要讲的“思维模式”是人的思维方式,即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指的是人的一种思维程序,一种思维方法。某种思维一旦在人群中形成固定的、主流的思维习惯和模式,便能成为人们的主体思维结构。美国学者查尔斯·理德指出: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他们的智力存在缺陷,使他们的头脑混乱不堪^[169]。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一、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

(一)中国人的主流思维仍是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欠缺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属形象思维,是一种感性思维,注重直觉体会,粗略地认识思维对象,而不追求对感性材料的深层思考与对事物的精确分析,多满足于经验的总结及对事物粗浅笼统的描述。一些学者指出:形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以上几种所谓“模糊”,最突出的是概念的模糊,概念的模糊是我们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概念模糊就很难清晰地认识未知世界,因为概念清晰是逻辑推理的基本要素,概念模糊就不可能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如果一个人概念模糊,你就不可能和他讨论清楚任何问题。所以,概念模糊也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轻视概念是不可能对范畴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上升为抽象逻辑思维。中国人重视直观和经验,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整体的粗浅的印象而不作周密详细分析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思维特别依赖于感觉,重视具象的知觉。这样的思维很难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缺乏对未

知领域的探索,对事物的规律和世界就容易产生不可知论。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模模糊糊地走过来的,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中国人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思考问题。

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以逻辑思维为主体,逻辑思维模式是一种高级抽象思维形式,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反映事物的本质,其结果不是模棱两可的,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确定的。这种思维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以此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点,形象思维是难以做到的。形象思维只能反映感性材料,而逻辑思维却能对感性材料进一步逻辑加工,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逻辑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罗素极为同意毕达哥拉斯的推论:“可知事物与可感事物……这个已确定的命题是永远正确的……只有可知事物才是真实的、完美和永恒的;而可感事物只是表象,是有缺陷和暂时的。”^[1218]这就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区别。

希腊人在2000多年前就取得了思维科学的伟大成绩,而中国人为何到现在仍停留在形象思维的阶段!中国的学者们回答是由于环境和社会条件造成的,但英国哲学家罗素不这样认为,他说:“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曾经为后来的希腊人提供了某些知识,但谁也没有发展出哲学和科学。其中的原因是否由于缺乏天赋或者社会条件,在这里并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两点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作用。最主要的是,宗教在智力的探险旅程中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125]因而罗素认为“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128]正是因为没有宗教的约束

和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得希腊人在短短的200年里,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辉煌成就。

(二)形象思维的形式化

中国人的概念本来就模糊,概念的模糊加之概念的僵化使得思维形式凝固在模糊状态中,所以中国人对所有的事物仅仅关注表面的模糊形式,不去探求形式里的内容,形式内容严重脱节。

鲁迅非常推崇并希望每个中国人都阅读一本书——美国亚瑟·亨·史密斯(中文名叫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这本书深刻地揭露了中国人的脸和面子的关系。他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放在全书的开篇:“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中国人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3]史密斯又说,对中国人来讲,“所有这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问题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我们不必到幕后去偷看真相,否则将会毁掉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适当地做出这种戏剧化的举动,这就是有‘面子’。如果做不出这些举动,忽略这些举动,阻挠这些举动的展示,就是‘丢面子’。”^[4]鲁迅和张伯苓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是死要面子不要脸^[5]。所以我们中国人面子是一回事,尊严又是一回事,只要能顾全面子,即使有损尊严的事都能干得出来。面子是什么?说白了,面子就是类似假面具的一种玩艺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可中国人却要求别人去尊重这个和脸没有任何关系的假面具,至于是否尊重本人,反倒不怎么在乎。面子和脸脱节,形式和内容脱节,这是中国人思维的一种典型特征。

我们古中国人有非常丰富、发达的形象思维,其重要的方法就是取象比类方法,这种思维方法,使我国在先秦时就产生了很高水平的哲学思想,并使我们的先人在科技创新和发明上遥遥领先西方。取象比类方法非常生动活泼,对深奥的道理能深入浅出地表达,像老子的《道德经》和中国古诗词等,这些作品语言的表达惟妙惟肖、丰富多彩,尤其是对人生哲理的领悟达到了很高境界。形象性是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思维对象是感知世界的形象,感知形式是意象、直感想象等形象性的思维形式,表达为能感知的图形、图像、图式和形象性的符号。

古中国人极为丰富的整体形象思维经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成形象化,由于缺乏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形象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形象化演变成形式化,对感知的客观世界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定势。因而丰富的、变化的客观世界经形而上方法形成的典型形

象在思维中变成固定的形式。这样,反映在我们中国人大脑中的客体就是形式化,就像辩证法很难形式化表达一样,形象思维感知的客观世界也很难用形式化来表述,但是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就不难解释我们的文艺作品为什么很难达到世界顶尖级水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几乎都有体会,我们中国的文艺作品离现实生活有一段距离,反映的是“不真”。因此自古以来的中国艺术作品能冲出国门而达到全球认可的大作很少,而像所谓美国科幻大片之类作品为什么连中国人也喜欢看呢?除了感官的刺激外,人们觉得片中的描绘很贴近生活,而不像中国的一些作品脸谱化严重,臆想出一些生活情节,人为制造矛盾等等,不符合生活的逻辑,让人总觉得脱离实在的生活,这就是形象思维演化为形式化带来的后果。典型的例子如中国画,中国画古代曾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可惜,由于思维方法的僵化,始终没有达到写实的水平,没有写实就很难有创新,所以中国画就走上了程式化的道路,千百年以来中国画几乎是千篇一律,从山水画到花鸟虫草画无一不是这样,发展极慢。中国传统美术家不在“求真”和写实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即所谓似与不似的艺术效果,而西洋人思维模式的精确性使西方美术家追求的是逼真的视觉效果,将透视的抽象因素表现在平面上,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互相作用的结果。

西洋人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不但使他们的艺术流光溢彩,也能向科学的未知领域不断扩展。洋人的绘画,为了写实对人体解剖学都要进行研究,并很早就解决了焦点透视和光线色彩等技术问题,而中国绘画,一直到西洋画传到中国都未能解决上述问题,因此,中国古传统画与西洋画相比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但我们的一些文人和国画家却表现出极不老实的态度,说洋人的画是“写实”,我们是“写意”,洋人是“求真”,我们是追求“意境”,这有些太牵强附会了。再怎么“写意”你总不能把山画成骆驼吧,总得让人看出是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什么“家”,为了面子什么歪理都能讲得出来。难道意大利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俄国希施金的《遥远的北方》没有意境吗?难道法国莫奈的《睡莲》和美国莫里斯·布雷兹·普伦德加斯特的《巴黎杜勒利花园》不是极高超的写意吗?正是有这种“求真”的精神,西洋人在写实的基础上发展出印象派、抽象派等等众多流派,把绘画演化为更广和更多的表现手段,技术和艺术一步一步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没有写实这个基本功

(基础),绘画技术和艺术水平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

在古代,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思想,也有辉煌的科技成果。先秦时,我们也有逻辑思维的萌芽,也有辩证思想。但可惜的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没有进一步发展,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很多反而被历史湮灭了,剩下的东西都凝固了或者被曲解了,变成了雨果认为的中国是个保存人类胎儿的酒精瓶。

美国的传教士马丁博士在中国工作了60年,他认为“中国人在中华文明未成熟时期所具有的很强的创造力,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几乎看不到。”^[558] 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中华武术也算是中国的瑰宝,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周边国家发扬光大。而我们自己呢?却一步步发展成了一种套路,和实际博弈失去了联系,变成了一种花架子,失去了实战的能力。我们祖先们几乎所有的创造,要不就失传了,要不就变成了固定而呆板的套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套路,一种形式,和客观地认识事物分道扬镳。我们总是把我们所知道的概念、观点、感觉、断语、定论不假思索地照搬,盲目地堆砌,来断定眼前出现的事物,离真实性相差太远,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越来越不一致。

(三) 中国人思维停留在感性阶段,难以上升为理性思维

中国先秦时期,也产生过理性的萌芽趋向,如以墨子为代表的形式逻辑观点和《易经》、《道德经》的辩证观点,但其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湮灭了。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和哲学的关键还是古中国人缺少“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精神。西方中世纪尽管受到宗教思想的禁锢,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哲学和思维科学的探索和研究,继续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文艺复兴之后就形成了庞大而精深的哲学和思维科学的体系。西方这些思想的巨人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赫拉克里特、巴门尼德、柏拉图等到西方近代的黑格尔和康德层出不穷。通观中国的历史,没有几个能比得上西方的那些思想的巨匠。

总之,古希腊人是为了真理(真实、真性)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的;而中国人是为了富贵而追求名利,是实用主义的。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生命,孔子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忧郁而亡。这两种态度必然会导致中西哲学和文化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四) 中国人缺少思维工具,缺乏对思维科学的研究

黑格尔指出:“真正讲来,只有思维才配称为哲

学的仪器或工具。”^[647] 用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可以深刻地反思中国既无哲学的理论体系又无科学理论体系,以及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

虽然中国历史上出了不少哲人、思想家,但似乎没有一个进入思维领域本身的研究,如何正确地思维,一直不是中国文人视野中的对象。思维的科学在中国文化历史上也几乎是一个空白,而西方从2000年前就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这种经久不息的研究,把思维工具打造得越来越犀利,逐步成为西方主流的思维模式。而中国正好相反,我们先秦时期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未对思维科学进行过研究,对思维的工具性缺乏自觉的认识,先秦时期曾出现的逻辑思维的火花,也是一瞬即灭。

而西方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虽然禁止异端思想,但对古希腊人启蒙的思维科学的研究,一直也没有停止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一直是中世纪哲学的研究对象。这个时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新逻辑学说,完善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中世纪的哲学家层出不穷,有影响的大哲学家哲学著作汗牛充栋,因此,为以后文艺复兴和科学的爆炸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的思想家一代比一代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些师生承传,一代超越一代。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767] 因而这些大思想家的学生们对老师们的学问,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更有发展,把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一个台阶发展到另一个台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是希腊学术的传统。西方是在怀疑和批判中进步,而中国是在诠释遵从中徘徊和衰落。

(五) 辩证法的滥用

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成果。人的上述认识阶段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是因为形而上学方法,产生了形式逻辑,而又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产生了辩证法理论系统。现代科学研究,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并经过知性的抽象达到理性。因而科学研究离不开形而上学方法,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都离不开形而上学的支撑。恩格斯很赞同黑格尔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之间关系的看法:“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乎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8132] 恩格斯在这里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和区别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缺少对“存在”和“存在作为存在”^①,以及其规律进行探索的思维形式的研究,没有形而上学的知识论传统,没有形而上学的历练和积累,其方法在中国亦没有形成气候。至于辩证法,我国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些辩证法思想。从《易经》到《道德经》都显示出对立统一和发展变化的辩证认识。近现代以来,又搬来西方辩证法理论,但经过我们大师们一通搅和,西方来的辩证理论和中国的八卦一样,什么东西都能往所谓的“辩证法”里套,什么都用“辩证法”,所谓“辩证法”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社会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指出:“辩证法在推理方面没有有力、可靠的规则,(就会)冒着违背辩证法真谛的危险。”^{[9]109}显然我们古代的辩证思想后来走偏了方向与没有形而上学的支撑是有关联的。

没有形而上学的支撑,辩证方法在没有基点的情况下怎么能发展呢?基础都没有,是无法盖高楼大厦的。因而,没有形而上学为根基,辩证思维只能走上歧路。所谓辩证法在我们中国既没有度,也没有量(这里指的“度”和“量”近似黑格尔《小逻辑》中的“尺度”),什么都能往里装,什么都用辩证法,所以西方来的辩证法理论和我们古代的辩证思想就这样变来变去,最后变成什么都能变的聚宝盆,变成诡辩术了。黑格尔指出:“东方无尺度的实体的力量通过希腊精神,才达到有尺度的有限度的阶段。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形形色色的材料加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丽富有化为规定性和个体性。”^{[10]161}黑格尔是辩证法理论大师,他一再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性,辩证法应有尺度;没有尺度和规定性,辩证法被滥用是必然的。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易经》中的辩证思想,这种自然现象和规律被古中国人认识到了。但认识到了,不等于就是辩证法(学),仅仅是一种感性的东西,感性还需要经过知性的形而上学方法抽象到理性。恩格斯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他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是一致的。”^{[11]547}古中国人没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进一步地提升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自然规律还没有经思维加工为一种自觉的、主观的思维规律,没有形成一个辩证理论体系,没有度和量的把握。所以《易经》怎么解释都行,和西方来的辩证法理论一样,容易被歪用,形成思维的混乱。辩证思维没有形而上学方法支撑就容易向诡辩的方向发展;即“冒着违背辩证法真谛的危险”。

因此,缺少形而上学的支撑,辩证法只能向诡辩和不可捉摸的方向发展。形象思维也有一定的逻辑性(布留尔界定为原逻辑),但由于没有上升为理性思维,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和对辩证法的歪用,必然会导致思维混乱。这就是尼斯贝特指出的没有可靠的规律,就可能违背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二、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怪圈

思维的混乱必陷入思维的怪圈,思维的怪圈必陷入僵化,思维的僵化又进一步导致概念的进一步僵化。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日积月累已经成了我们的主流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已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思维的惯性。这种僵化的思维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头里去了,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成了一种动物性的条件反射了。不但逻辑思维缺乏,连直觉思维的悟性也大多丧失。我们的思维就这样陷入到歪用的《易经》式的怪圈里不能自拔。所以,我们对于外界任何事物,本能地按着这样的思维套路去走。包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习惯性地和本能地按照我们固有的思维套路去学,所以只学到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即使是学理工科的人,虽然受到过逻辑思维被动的训练,但一旦离开了书本指定的方法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接受了那么多外来文化,但我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多少改变就是实例。

《易经》所表示的中国的思维怪圈和西方的思维是大相径庭的,西方的思维形式是直线的,表现为螺旋式结构,是三维立体结构,呈现出的是上升趋势,这种思维结构具有极强的空间抽象能力。同样,这种结构具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抽象的逻辑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正是现代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而中国的思维结构为一个平面的圆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思维只能在感性中按固定的套路游走,很难有突破性的创造。

先秦以前的思维结构是一个圆弧形的,有可能发展为西方式的螺旋结构。但是,我们古中国人对其先人的思维和思想成果缺乏批判和继承,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是有所退步,而且是一步一步地趋向僵化。同时,由于受被曲解的《易经》这样的思维陷阱的影响,使圆弧变成了圆圈。从此,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就只有在这个怪圈里转,很难有突破,于是我们的思维就停滞了。思维的停滞带来的必然是文化和科技的停滞,我们老大中国变成了一个马戛尔尼所说的“停滞的帝国。”^[12]

^①中国学者王路对此用词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多数情况应翻译为“是”。

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思维结构,凡是实用的思想都可以吸收到思维圆圈内,凡是理想主义思想都排斥在思维圆圈外。这个怪圈一旦形成,它就决定了文化的走向,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接受了那么多西方文化思想,不但不能消化,往往还滥用,思维模式却没有多少变化。同样也不奇怪,各种各样对立思想都能在圆内共存。哪个实用就拿哪个来用。如我们中国人在信仰上可以同时信“儒、道、佛”三教,甚至还可以同时信仰基督教,各种思想意识能够互不干涉并能达到平衡而和谐。一个中国人能同时信奉多种宗教,在全世界其他民族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我们中国人民有这个本事做到,因为有一个前提条件——实用。黑格尔讲:“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前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13]8-9} 从我们上述讲的怪圈中可以看出黑格尔讲的并不足为奇了。

三、混乱、僵化的思维造成的后果

概念模糊、不证而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滥用类比,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极普遍现象。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一下这种社会现象就会发现,几乎在我们中国人的谈话中不超过3分钟就会出现我们上面讲的逻辑错误。

逻辑思维的薄弱和思维方法的僵化,使我们中国人极度缺乏想象力,但臆想功能却非常强大,什么事都能给你解释,什么道理都会说。报纸上经常刊登中国的父母为什么在子女面前没有威信,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父母经常对孩子说一些毫无根据的所谓“道理”。对于他们自己都不懂的事,也能对孩子说得头头是道,久而久之,孩子从学校或书本上或社会上看到、听到和父母讲的不一样!孩子自然就不服气了。即使我们的一些名人,也经常凭自己的感觉下一些没有求证也无法证实的断语。罗素这样评价说:“满脑子都是简便易行的理论,凡事都有自圆其说的解释,时常想说服他人没有他们弄不懂的事,人类的命运无一能够超出他们的系统。”^{[14]8}

在中国的文化中,各种人生理念都有,既有视

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又有卖主求荣的活命哲学;同样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各种对立的思想都有。所以,中国人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采用哪些话语,一切都是为了眼前的需要,中国的这种文化现象,世界其他民族是极少有的。中国人虽然思维工具的作用不够发达,但嘴巴的功能却是异常发达,像战国时期的张仪,被楚王下令打得半死,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舌头还在否?”所谓“舌战群儒”在中国也是脍炙人口的经典。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嘴皮子的功能也异常强大,讲道理很厉害,做事却不行。比如,我们现代中国人,几乎人人都讲辩证法,人人都讲要全面看问题,却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辩证法;也没有几个人真正全面地看问题,一切不过是一种口实、一种借口,无非是耍嘴皮子的功夫。“辩证法”的滥用,除了给一切事物解释得通的、现存的、不费力的依据外,还给人们逃避责任找到了借口,所以,我们中国人愿意将责任全部都推到客观因素上。犯了错误或没有成绩全都是别人的错,同事不好、上级不好、单位不好、体制不好、政体不好、气氛不好等等。这样我们中国就成了一个意见大国,对全世界都有意见,就是对自己没有意见。我们稍微理性点就可以观察到:我们中国人的谈话大体只有两个意思,首先给自己评功摆好,拼命证明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清白、自己的成绩、自己对人的友善、自己的良心。然后就是叙说别人的不是、同事的不是、领导的不是、单位的不是、体制的不是。因此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懂得反省和认错,往往为了掩盖自己的一个错误而制造更大、更多的错误。

近一百年,甚至上溯到一千年以来,我们中国在对外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吃亏的。如果是遇到强国大国我们可以自我安慰:人家强大我们没办法。可是我们和小国、弱国打交道,仍然总是吃亏,总不能都推到客观因素吧!西方谚语说:“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栽两次跟头”。而我们栽了无数跟头还不知醒悟。我们总要检查一下自己,我们的思维在哪出了毛病。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已经陷入了思维的怪圈了,既混乱又僵化,对客观就看不明白,也不可能使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 [1] 亚瑟·亨·史密斯. 中国人的脸谱[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2] 伯特兰·罗素. 西方的智慧[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3] 亚瑟·亨·史密斯(明恩溥). 中国人的气质[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4] 何宗思. 中国人格病态批判[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 [13] Gibbs Jr R W.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4] 董成如. 转喻的认知解释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27(2): 6-9.
- [15] 蔡晖. 转喻思维产生动因的多元思考 [J]. 外语学刊, 2006(6): 41-45.
- [16] 徐盛桓. 转喻与分类逻辑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 40(2): 93-99.
- [17] Marina Rakova. The philosophy of embodied realism: a high price to pa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2, 13(3): 215-244.
- [18]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2): 82-89.
- [19] 张建理. 汉语“心”的多义网络: 转喻与隐喻 [J]. 修辞学习, 2005(1): 40-43.
- [20] 王寅, 王天翼. “AS 认知方式”: 隐喻等机制的统一解释——十五论语言的体验性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32(4): 1-6.
- [21] Koch, Peter. Frame and Cognity: On the Cognitive Bases of Metonymy and Certain Types of Word Formation [C]/In Panther, Klaus-Uwe and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1999: 139.
- [22] 陈嘉映. 语言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23] Lewis D. Counterfactuals [M]. Basil Blackwell, 1973.
- [24] Lewis D.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 [25] 褚孝泉. 拉康选集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26] 张一兵. 能指链: 我在我不思之处——拉康哲学映象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5(1): 55-61.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Metonymy

LI Ke, LI Shukang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Shandong Yantai 264005)

Abstract: Metonymy is more a cognitive mode of human beings than a rhetoric device. As an important linguistic phenomenon, metonymy draws the attention of both linguists and philosophers. The paper intends to discover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etonymy-embodied philosophy and AS mode of cogni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and logical features of metonymy. What's more, 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which metonymy reveals.

Key words: metonymy; philosophical basis; embodied philosophy; AS mode of cognition

[责任编辑: 箫姚]

(上接第 134 页)

- [5] E A 罗斯. 变化中的中国人[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5.
- [6]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7]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8]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9] 理查德·尼斯贝特. 思维的版图[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
- [10] 黑格尔. 哲学精神讲演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12] 佩雷菲特. 停滞的帝国[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2007.
- [13]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 [14] 罗素. 中国问题[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6.

Analysis of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

CHU Yu

(Beij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97)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is built on images, lacking analytical, synthetic and abstract elements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logical thinking process. It is stymied in senses. Confusion in thinking is prone to be stuck in vicious circles, leading to petrification of thoughts and constitut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pattern. This kind of confusion and rigidity has obstructe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confusion and petrification; obstructing China's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孟青]